

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与国内劳资冲突： 基于 1928—1936 年上海各行业的分析^{*}

李耀华 狄丹阳

内容提要：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是否会影响国内劳资冲突？本文基于近代《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上海劳资冲突微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商品进口冲击对国内劳资冲突的影响。结果发现，近代商品进口增多会显著增加国内劳资冲突。从影响机制分析，这是进口商品冲击了国内市场，导致国内企业经营困难，随后企业无论是采取裁减劳工还是降低工人日工资的方式应对困难，都会带来劳资之间冲突的增加。

关键词：商品进口 劳资冲突 近代上海

一、引言

劳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一部分，一直都是广受关注的问题。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近代中国的劳资冲突，不但对相关历史事实研究有贡献，而且对现实经济社会运行也十分有借鉴意义。查阅近代中国劳资冲突的相关研究，发现不少学者从工运政策、科学管理、企业制度、解雇风俗、铁路建设、货币体系等方面解释了诱发当时劳资冲突的原因，^①但依然较为缺乏从国际贸易角度进行的相关分析。本文尝试从国际商品进口冲击的角度解释近代劳资冲突的产生。

本文利用近代上海(1928—1936)各个行业的劳资冲突作为数据来源，这主要基于如下的考虑：(1)上海是近代中国企业聚集地，也是劳资冲突集中发生地，因此其样本具有代表性。据中央工厂检查处调查，1935年上海工厂已达5480家之多，约占全国工厂半数以上。^②而同时期上海的劳资冲突数量也占全国的一半左右。^③平均看来，在1928—1936年间上海每年发生劳资冲突约

[作者简介] 李耀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上海，200433，邮箱：liyaohua@mail.shufe.edu.cn。
狄丹阳(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南京，210023，邮箱：di_danyang@163.com。

* 本文受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与思想研究”(2020110932)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① 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1930年代美亚细亚厂为个案》，《史林》2013年第6期；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田彤：《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0—184页；霍新宾：《“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林鑫：《铁路建设对经济罢工的缓解作用——基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定量研究》，《财经研究》2015年第5期；Fabio Braggion, Alberto Manconi, and Haikun Zhu, “Credit and Social Unrest: Evidence from 1930s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138, No. 2(2020), pp. 295–315。

② 俞燮麟：《上海工业之回顾与前瞻》，《申报》1941年2月3日，第9版。

③ 根据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103、108—109页内容统计可知，1932年全国劳资纠纷239件，上海91件，全国罢工停业84件，上海47件，上海劳资冲突合计占全国42.72%。另外，根据实业部中国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77、84页内容统计可知，1933年全国劳资纠纷849件，上海525件，全国罢工停业168件，上海117件，上海劳资冲突合计占63.13%。

370起。^①(2)选择上海来识别商品进口冲击对劳资冲突的影响,能够避免相关研究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因而使得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近代中国被迫开放通商,作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市场,对大部分商品的进口数量都没有决定权,因此商品进口数量的变动可看作较为外生的经济冲击。(3)这段时间中国整体的政治环境趋于稳定。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结束了军阀割裂的动荡局势。(4)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初建,虽然对银行、海关、邮政雇员等有所保障,但对大部分企业所雇工人几无保护,^②因此对近代上海劳资群体的研究能够测算出国际商品进口对劳资冲突的直接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1928—1936年上海21个行业的历史匹配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回归考察商品进口数量与劳资冲突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商品进口数量与劳资冲突的数量正相关,即较多的商品进口会导致国内相关行业劳资冲突的增加。该影响的具体大小为:商品进口数量每增加100%,工业企业的劳资冲突数会增加23.7%,冲突关系厂号数增加32.3%,冲突关系工人数增加48.2%。

在此之上,本文将全国其它地区商品进口数量作为上海市商品进口数量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发现商品进口数量与劳资冲突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显著,并且系数值有所提高。具体数据为:商品进口数量增加100%,劳资纠纷案件数上升51.2%,冲突关系厂号数上升65.8%,冲突关系工人数上升69%。本文为了回归结果的稳健,又考虑了替代性解释——企业制度和爱国情怀,通过分别剔除因为企业管理制度导致的案件以及发生在外资企业的案件进行检验,发现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在影响机制的分析中,文章主要使用历史资料进行案例梳理,得出相应可能的机制。并在随后的调节效应中进行验证。最终,本文认为进口商品数量对劳资冲突影响的机制如下:国际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多会削弱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并进而导致企业解雇工人或降低日工资,激起劳资冲突。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拓展了对近代中国被迫通商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认识,^③认为国际商品的自由进口会带来国内企业的劳资冲突。其次,丰富了经济冲击对社会冲突影响的相关研究,^④肯定了经济冲击,特别是商品进口冲击所带来的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最后,丰富了历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劳资冲突的相关研究,从国际贸易视角探讨了劳资冲突发生的原因。

二、历史背景:劳资冲突和商品进口贸易

近代中国的劳资冲突随着工业企业和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与日俱增。依据对1928—1936年上海劳资冲突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雇佣状况和增加工资等经济诉求是劳资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国的工业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国际商品进口的数量变化会影响国内相关行业劳资冲突的发生。

(一)近代上海劳资冲突的规模和成因

自19世纪中期中国工业企业诞生以来一直存在劳资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中国

① 根据本文数据统计计算得到。

② 李耀华:《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演化:强制储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129页。

③ Jia Ruixue, "The Legacies of Forced Freedom: China's Treaty Por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6, No. 4 (2014), pp. 596–608; 梁若冰:《口岸、铁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林鑫:《通商口岸、新式教育与近代经济发展:一个历史计量学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④ Cao Yiming and Chen Shuo, "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191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2, No. 5 (2022), pp. 1555–1590; Josh De Lyon and Joao Paulo Pessoa, "Worker and Firm Responses to Trade Shocks: The UK-China Cas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33, No. 103678 (2021); Dell Melissa, Benjamin Feigenberg, and Kensuke Teshima, "The Violent Consequences of Trade-Induced Worker Displacement in Mexic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Vol. 1, No. 1 (2019), pp. 43–58.

工业企业发展缓慢,因此劳资冲突尚处于萌芽阶段。^① 根据刘明逵、唐玉良统计,1840—1913年74年间仅发生经济罢工349起,每年平均不到5起。^② 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近代工业企业的迅速发展,劳工为保护权利和维护权益,开始主动建立各类劳工团体与资方对抗,劳资冲突成为近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据陈达统计,1918—1926的9年间共发生罢工停业1098起,平均每年121.88起,罢工人数总计123.1804万。^③ 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虽然经历了清党运动和工会整理,但由罢工停业和劳资纠纷共同构成的劳资冲突依然居高不下。在本文的统计中,1928—1936年仅上海一地发生罢工停业709起,劳资纠纷1880起。

近代中国的劳资冲突主要由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组成。劳资纠纷是指劳资双方进行交涉而厂号内并未停止工作的劳资冲突。罢工停业是指劳方或资方使厂号内暂时停止工作,以求达到某项要求或拒绝某项要求的劳资冲突。^④ 虽然劳资纠纷的发生频次更高,但是罢工停业平均每起案件关系厂号数和工人数更多。劳资冲突的规模一般可由劳资冲突的案件数、关系厂号数、关系工人数等统计数据反应出来。图1给出了1928—1936年上海不同形式劳资冲突的规模。关于劳资纠纷,上海工业企业共发生1880起,关系厂号6473家,关系工人58.9444万人,平均每起案件关系厂号3.44家,关系工人314人。关于罢工停业,上海工业企业共发生案件数709起,关系厂号4431家,关系工人61.3984万人,平均每起案件关系厂号6.25家,关系工人866人。可见罢工停业的案件数约为劳资纠纷的一半,但其平均每起案件关系厂号数和关系工人数大致是劳资纠纷的两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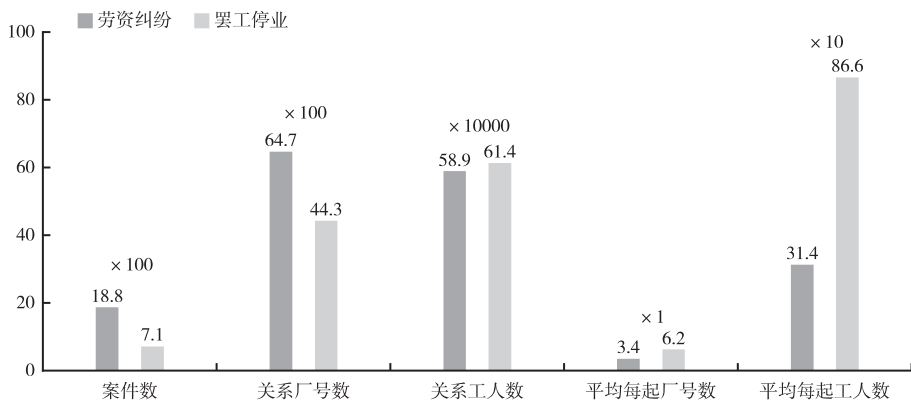


图1 1928—1936年近代上海不同形式劳资冲突的规模

资料来源:劳资纠纷数据由上海市社会局统计1934年编印《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和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统计1938年编印《近四年来上海的劳资纠纷》整理得到,罢工停业数据由上海市社会局统计1933年编印《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和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统计1938年编印《近四年来上海的罢工停业》整理得到。图2、图3、图4资料来源均同图1,不再一一标注。

说明:为了在同一图中比较,图1将各指标换算成不同单位数据。其中,平均每起厂号数的单位为个,平均每起工人数的单位为十,案件数、关系厂号数的单位为百,关系工人数的单位为万。因此,每根柱子上方的数字需要根据其上提示倍数进行扩大还原解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冲突中工人的直接诉求更偏重于切身经济利益。虽然骆传华、刘明逵和唐玉良、裴宜理等学者从政治角度解读劳资冲突,^⑤但是“四一二”事变后,所有与中共相关的

① 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②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75页。

③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7页。

④ 邢必信等编:《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中),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84—85页。

⑤ 参见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3年版;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劳工团体被解散,阶级斗争对劳资冲突的作用被压制。根据国际劳工局的分类标准,将劳资冲突分为与团体交涉有关、与团体交涉无关两大类,前者包括工会或团体协约和雇佣状况,后者包括同情、政治和其他因素。1928—1936年因工会或团体协约发生劳资冲突的案件共计192起,仅占总数的7.42%,因雇佣状况发生劳资冲突的案件共计2358起,占总数的91.08%,因同情、政治及其他因素发生劳资冲突的案件共计39起,占总数的1.51%,具体年度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在图中清楚地看出,在诸多劳资冲突发生原因中代表经济利益的雇佣状况占了最大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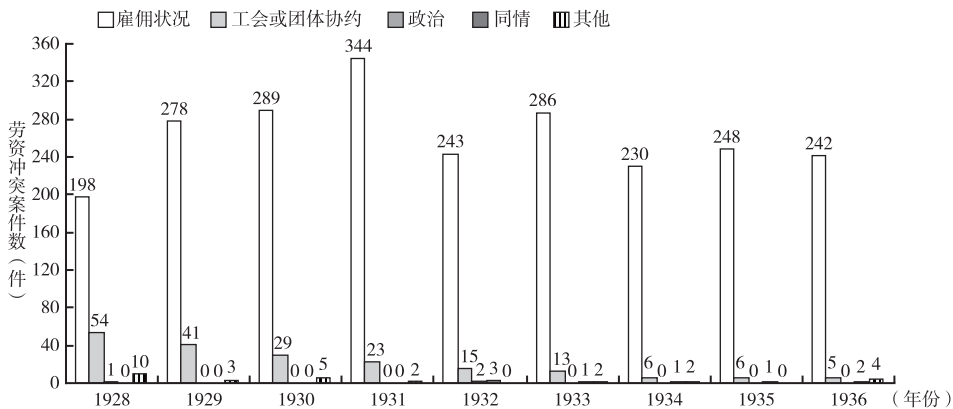


图2 1928—1936年近代上海劳资冲突成因

说明:每一年份依次有五根柱子,数字代表了发生次数,因为有0或1,所以有些柱子并不突出。

根据雇佣状况的细目划分,^①雇佣或解雇和工资占据劳资冲突成因的前两位,然而二者对不同劳资冲突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根据近代上海劳资冲突雇佣状况细目分析,1928—1936年,因雇佣或解雇发生劳资冲突共计1387起,占雇佣状况的58.82%,因工资发生劳资冲突共计568起,占雇佣状况的24.09%,即因解雇或雇佣及工资原因所产生的劳资冲突占了82.91%。具体到劳资纠纷,雇佣或解雇原因导致案件共1198起,占劳资纠纷总数的63.72%,工资原因导致案件共278起,占劳资纠纷总数的14.79%。因此,雇佣或解雇是劳资纠纷的主要诱因。具体到罢工停业,工资原因导致案件共290起,占罢工停业总数的40.9%。雇佣或解雇原因导致案件共189起,占罢工停业总数的26.66%。因此,工资是罢工停业的主要诱因。具体年度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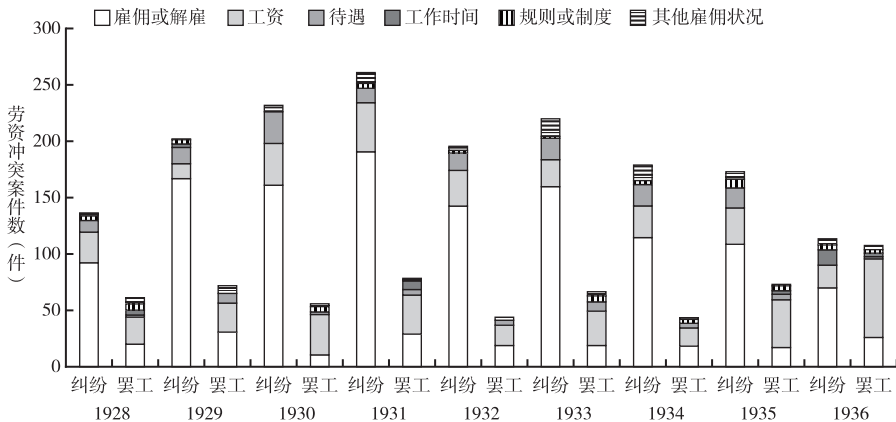


图3 1928—1936年近代上海劳资冲突雇佣状况细化成因

① 根据上海社会局统计,雇佣状况细目成因具体包括雇佣或解雇、工资、待遇、工作时间、规则或制度和其他雇佣状况。

以往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劳资冲突的规模变化趋势并未形成共识。汪华认为1928—1936年上海劳资纠纷的数量和范围逐渐呈现下降趋势,^①张仲礼认为1927年“四一二”之后到1937年“八一三”之前,上海的劳资争议经历了激烈—相对稳定—激烈的发展变化。^②而田彤则认为全国的劳资争议在1932年之前下降或持平,之后“不仅未曾缓和,反而日益激化”。^③然而,根据相关历史资料分析,近代上海的劳资冲突具有较大的行业差异性,且不同行业劳资关系恶化或缓和趋势不同。从本文划分的21个行业分析,^④首先,1928—1936年上海劳资冲突集中发生于某些行业,如棉纺业、棉织业、丝织业、染织业以及橡胶业和卷烟业这六大行业,共发生劳资冲突案件数1284件,占21个行业案件总数的75.7%。其次,各个行业劳资冲突变化趋势并不相同,例如:棉纺业、橡胶业劳资冲突在1931年之后明显增多;棉织业、卷烟业的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1928—1932年;丝织业的劳资冲突在1930年后一直维持在高位,几乎每年都在40例左右;染织业的劳资冲突除1933年、1936年较低,其他年份均在15例以上;火柴业呈现“U型”走势,经历了激烈—和谐—相对增多的趋势。这种行业劳资冲突变化趋势的不一致也为本文提供了切入口。

(二)近代上海进口贸易与劳资冲突

近代中国一直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销售市场,国际贸易的变动对国内商品生产影响重大。商品进口冲击对劳资冲突的影响与国内企业发展和劳动力规模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国的工业还处在手工业阶段,民族工业企业发展不充分,无法抵御外来工业商品的冲击。根据杜恂诚的统计,1840—1913年的74年间,全国历年所创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仅1117家,^⑤1913年全国男女工共计63.089万人,^⑥工业企业和劳动力人数都极其有限,因此进口冲击未引发广泛性的社会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暂时的贸易中断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⑦一战后,各类工业企业纷纷建立,民族资本涌入新式工业,近代中国工业体系初具雏形,^⑧工矿企业和劳动力人数迅速增加。1914—1927年的14年间,全国历年所创工矿企业达1820家,1930年29个城市男女童工人数共120.43万人,^⑨1933年增至200万人。^⑩同时,西方势力卷土重来,国货和洋货激烈竞争市场份额,中国民族工业受到极大冲击,加剧了工业劳动者生活的不稳定,社会劳资冲突的起伏不断。1929—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虽进行了4次国定税则的调整来应对进口冲击,但是其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无法为我国幼稚的工业提供真正的保护。^⑪正如上海商会常务委员柯干臣所言:“盖经济侵略,有如慢性痲瘵,军事侵略,有如急性霍乱,后者咸知惊戒,咸知预防,而前者类都漠然,类都忽视,玩延日久,每致一蹶不振,无可救

① 汪华:《劳资冲突视野下社会保障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反思——基于民国时期上海社会保障的一项实证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②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66—611页。

③ 田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劳资争议总体概述》,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3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28页。

④ 21个行业在9年间发生劳资冲突的次数按多到少依次为:丝织业377起,棉织业217起,棉纺业198起,卷烟业172起,染织业166起,橡胶业154起,制材业75起,皮革业62起,火柴业56起,造纸业45起,水电业39起,食品业37起,涂料、染料、油墨业18起,金属业18起,毛织业14起,制伞业13起,水泥业13起,玻璃业8起,造酒业7起,面粉业6起,酸碱化学原料业1起。

⑤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⑥ 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13页。

⑦ Liu Cong, “The Effects of World War I on the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Was the World’s Trouble China’s Opportun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80, No. 1 (2020), pp. 246–285.

⑧ 方书生:《近代中国工业体系的萌芽与演化》,《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⑨ 邢必信等编:《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上),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4页。

⑩ 实业部中国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4页。

⑪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程麟荪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药”。^① 作为世界商品销售地,进口冲击最终对中国的工业企业和工业劳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历史资料里也有国际贸易导致劳资冲突的描述。关于缫丝业,1926—1931年上海华丝面临日丝的激烈竞争,而中国关税不能真正自主,在对外贸易中厂商只能各自为战,风险极大,整个行业举步维艰。1927—1930年,国际丝价连年下挫,中国丝厂亏损严重。为了降低成本及转嫁风险,资方采取解雇、减薪手段,导致停产罢工不断发生。^② 其中,1928年上海全市丝厂发生大规模罢工,涉及全市男女工人数6.45万人,丝厂89家。^③ 关于纺织业,1933年纱厂减工风潮的起因是日棉倾销,纱价狂跌,这里的日棉不仅指国内日货,也包括进口棉货。为应对“产量过剩”,华商纱厂联合实行减工,“全国停锭数达五十万枚以上”,减工者不计其数。^④ 关于丝织业,1934年美亚10个绸厂共计4千余工人,发生近50日大罢工。背后是价格低廉的欧美丝织品大量冲击中国市场,加之本国丝厂“工值迭增,出品次劣”,使“厂方负担太重”,已“势难维持”。总工会告美亚工友书:“帝国主义者,复乘我之危,除加紧其政治之侵略外,更实施商货倾销政策,作经济上之侵略”,“此次美亚绸厂,以绸业极度衰落,营业无法维持为理由,在未经呈奉党政机关核准以前,突然宣告减低工资,致使工友生活,发生影响”。^⑤ 从以上案例可知,商品进口冲击对近代上海劳资冲突的影响不可忽视。

本文关于1928—1936年商品进口和劳资冲突的数据也初步支持了商品进口的增加会激化劳资矛盾,引发劳资冲突的观点。图4给出了1928—1936年上海商品进口冲击和劳资冲突的变动情况。图4(a)为人工造细丝等商品进口数量与丝织业劳资冲突的变化情况,图4(b)为本色市布等商品进口数量与棉织业劳资冲突的变化情况,图4(c)为橡皮及树胶等商品进口数量与橡胶业劳资冲突的变化情况,图4(d)为烟叶、纸烟等商品进口数量与卷烟业劳资冲突的变化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行业商品进口数量的变化周期不同,但都清楚地表现了商品进口冲击和劳资冲突增加的正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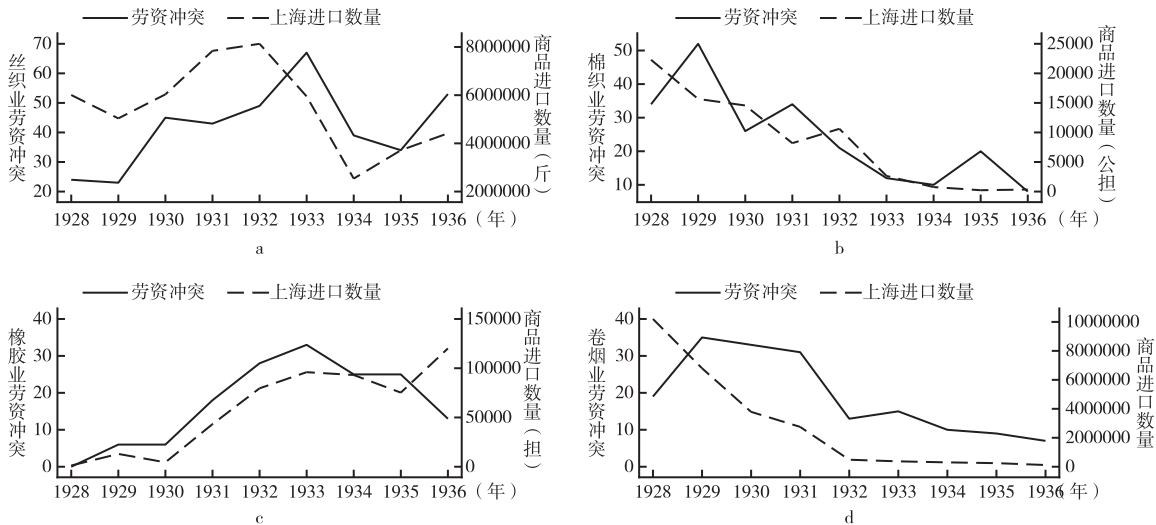


图4 1928—1936年上海商品进口数量与劳资冲突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商品进口数量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资料(1859—1948)》整理得到,劳资冲突数据同图1。

① 柯干臣:《上海市商会国货商场特刊·服用国货宣言》,《申报》1934年8月2日,第18版。

② 陈光:《1926—1931年上海缫丝业劳资关系述评》,《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2期。

③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8册,第817页。

④ 田彤:《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第137页。

⑤ 《美亚工人包围社会局昨派警驱逐至午始散》,《申报》1934年4月12日,第11版。

(三) 影响劳资冲突的其他因素

劳资冲突是近代工业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界对近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多有创获,其重心在于劳工生活状况和劳工组织问题。

劳工的生活状况是研究近代劳资关系的重要内容。^①“工人家庭所要求的不是政治宣言,而是实惠的经济利益。”引起劳资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恶化。^②劳工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中国工人不仅名义工资水平极其低微,实际工资的水平亦是每况愈下。以劳工工资和生活费变动来说明:根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以1930年工资指数为100,1932年工资指数为96.61,1934年工资指数为94.92,1935年工资指数为89.83,1936年工资指数为93.22。^③这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阶层的工资率水平大体上是稳中有降。反观上海生活费指数,根据国定税则委员会统计,以1926年生活费指数为100,1928年生活费指数为102.5,1930年生活费指数为121.8,1932年生活费指数为119.1,1934年生活费指数为106.2,1936年生活费指数为113.3。^④显而易见,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费指数呈现上扬的态势,只是这一态势表现得有起伏而且缓慢。工人为谋生计,纷纷要求资方加薪,以此为目的的罢工此起彼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现了几乎波及所有行业的加薪运动。

劳工组织也是学者研究近代劳资关系的重要内容。在目前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的理论中,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最大。“四一二”事变后,国民政府解散了所有与中共有关的劳工团体,剩余劳工团体一律在农工商局办理注册核准,并按次序颁发执照,正式将劳工团体纳入国民政府的管制范围。1928—1929年,共批准注册工会217个,1930年1月—1930年7月又批准注册37个。^⑤1929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民国历史上第一部《工会法》并于当年11月1日开始施行。1931年,按照工会法规,上海市工会实行按区域划分,所有工会重新加以改组整理,全市共分为11区,在同一区域内同一行业仅能组织一工会,明确将工会分为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改变了以往按照企业组织工会的做法。工会不断的改组整理,实际是对控制权的争夺。^⑥通过改组,工会数目锐减,国民政府实行指导与控制相结合的政策,并对工会组织罢工活动加以限制。^⑦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为了揭示国际商品进口冲击对国内劳资冲突的影响,本文采用上海1928—1936年21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识别相应的因果关系。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以上海为例考察近代商品进口冲击对劳资冲突的影响,设定如下的线性计量模型:

$$Y_{it} = \alpha_0 + \beta_1 Import_{it} + \Gamma Control_{it} + \the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t} 包含 $lconflict$ 、 $lfrim$ 和 $lemployee$ 三个度量指标,分别表示行业 i 在年度 t 所发生的劳资冲突的案件数、关系厂号数和关系工人数。 $Import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商品进口数量。其值越大,表明商品进口数量越多,预计估计系数 $\beta_1 > 0$,即商品进口数量越多,国内行业发展空间越

① 参见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何德明编著:《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③ 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印:《上海劳工统计(1930—1937)》,1938年印行,第10页。

④ 《上海物价月报》第13卷第4期(1937年)。

⑤ 工会被核准注册的数据1928—1930年来自于《社会月刊》,1931—1936年来自于《实业公报》。

⑥ 田彤:《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第85—135页。

⑦ 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小,此时劳资冲突越多。 $Control_{it}$ 为一系列与行业特征和年度趋势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工会会员率、每小时工资率、劳方胜诉率、上海生活费指数、上海年度户籍人口数。 θ_i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μ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劳资冲突的数量和程度,具体包括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两种冲突形式。以劳资冲突发生案件数(取对数)衡量劳资冲突的数量,以关系厂号数(取对数)和关系工人数(取对数)衡量劳资冲突的程度。劳资纠纷数据选取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统计编印《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和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统计编印《近四年来上海的劳资纠纷》;罢工停业数据来自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统计编印《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和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统计编印《近四年来上海的罢工停业》。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以主管行政官署归档保存的调解或仲裁申请书为根据,按照申请书和笔录的号次,从第一号起到统计日为止,编成索引,逐月编制案件表。统计内容为1928—1936年按照发生时间详细记录各案件信息,包括发生原由、发生行业、企业产权、关系厂号数、关系工人数、纠纷总日数、调处者、结果等信息。通过整理,本文统计了1928—1936年上海具体每个行业劳资冲突发生的数量、关系厂号数、关系工人数、劳方取得完全或部分胜利所占比重,总计冲突案件数共3333件。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剔除了服务业样本,最终获得2589个工业企业劳资冲突案件数,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是21个行业9年形成的面板数据,共计189个样本观测值。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上海的江海关商品进口数量(取对数)作为商品进口冲击的主要代理变量。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入超状态,且出口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主要以农产品和矿产品等低附加值的商品为主,而进口产品种类繁多,国内产业的波动与进口商品密切相关。同时,近代中国对于大部分进口商品没有决定权,因此商品进口数量的变动可大致看作外生冲击,能够较为干净的识别经济冲击对劳资冲突的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依据劳资冲突相关行业,通过整理匹配了相关商品进口数量。同时由于统计年份产品单位不一致,我们也进行了产品的单位统一化,如将本色棉纱、纯毛粗细呢线、棉花、普通印书纸等的单位统一换算成担,火酒酒精统一换算成英加仑,轻木材统一换算成百英方尺,本色市布统一换算成正、纸烟统一换算成千支等。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现有关于劳资冲突影响因素的文献,选取诸多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减少回归中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选择那些与商品进口数量和劳资冲突相关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无法与商品进口量形成明显的互为因果关系。综合考虑,重点需要控制劳资冲突的行业特征变量和年度控制变量。行业特征变量:(1)本文以上海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变量(新设工业企业数与1933年该行业工厂数之比)^①控制国内行业发展引致劳动力需求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数据来自杜恂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以上海男时工每小时工资率变量控制劳工工资所导致的劳资冲突。^②针对部分细分的行业工资数据,本文通过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③中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接近度寻找相似行业,并以该相似行业的工人工资水平填补缺失行业数据;(3)以工会会员率变量(上海工会会员数与1933年该行业工人数之比)控制工会组织对劳资冲突的影响。工会会员数是以当年累积的

① 除以1933年工厂数是为了消除规模效应,1933年数据来自刘大钧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

② 数据来自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特别市工资指数之试编》,大东书局1929年版;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印:《上海劳工统计(1930—1937)》。

③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被核准工会的会员数减去累积的被吊销工会的会员数计算得到。被核准工会的数据 1928—1930 年来自于《社会月刊》、1931—1936 年来自于《实业公报》。被吊销工会的数据来自《上海市政府公报》。在工会注册和吊销数据上,本文进一步结合《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上海市年鉴(1935)》、《上海市年鉴(1937)》(下)、何明德的《中国劳工问题》等对各年度现存工会数量和会员数量进行整理校对。(4)以劳方胜诉率(劳方取得完全胜利和部分胜利案件数占劳资冲突总数之比)^①控制政府劳工政策转变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清党后,国民党劳工政策由单纯保护农工向既扶持农工又注重实业转变。^②该劳工政策的改变会影响劳资冲突发生的可能。年度控制变量:(1)以上海生活费指数控制上海生活费水平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数据来自《上海物价月报》;(2)以上海户籍人口控制人口规模效应。数据来自《统计月报》《统计季报》。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 1 给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劳资冲突案件数(log)	189	1.637	1.175	0	1.609	4.220
关系厂号数(log)	189	1.927	1.497	0	1.609	6.120
关系工人数(log)	189	5.037	3.284	0	5.493	11.100
商品进口数量(log)	189	11.45	2.272	5.330	11.770	16.100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189	0.080	0.223	0	0.013	2.500
工会会员率	189	0.936	2.277	0	0.162	18.600
上海户籍人口(log)	189	14.400	0.111	14.200	14.420	14.600
每小时工资率	189	0.073	0.0471	0.040	0.059	0.480
上海生活费指数	189	112.3	7.7201	103	107.9	126
胜诉率	189	0.802	0.2565	0	0.857	1

四、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首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基准回归。其后为了进一步排除内生性,使用除上海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口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最后,使用 Tobit 模型和 Poisson 模型进行研究方法敏感性检验、指标敏感性检验,亦对替代性解释企业管理制度和爱国情怀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商品进口冲击影响劳资冲突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3)列依次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第(4)—(6)列是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和行业、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以及改变被解释变量度量指标,商品进口数量对劳资冲突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这说明商品进口数量越多,国内行业的劳资冲突案件数越多、影响范围更广。具体的影响程度以第(4)—(6)列回归结果为例,商品进口数量每增加 100%,工业企业的劳资冲突数会增加 23.7%,即回归(4)中商品进口数量的系数为 0.237,冲突关系厂号数增加 32.3%,即回归(5)中商品进口数量的系数为 0.323,冲突关系工人数增加 48.2%,即回归(6)中商品进口数量的系数为 0.482。

^① 完全胜利是指劳方的要求被全部满足,部分胜利指劳方和资方各让一步的解决方案。从相关的案例分析,有时是有劳方的过失的,因此劳方的部分胜利也是胜利。

^② 上海市社会局编印:《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第 7 页。

表 2

商品进口冲击影响劳资冲突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案件数(log)	关系厂号数(log)	关系工人数(log)	案件数(log)	关系厂号数(log)	关系工人数(log)
商品进口数量 (log)	0.244 *** (0.0659)	0.332 *** (0.0921)	0.490 ** (0.196)	0.237 *** (0.0675)	0.323 *** (0.0949)	0.482 ** (0.199)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0.297 *** (0.0974)	-0.257 (0.169)	-0.688 (0.458)
工会会员率				-0.0334 ** (0.0128)	-0.0239 (0.0237)	-0.147 *** (0.0394)
上海户籍人口 (log)				2.028 ** (0.830)	0.640 (1.593)	5.404 * (3.060)
每小时工资率				-0.0286 (0.357)	-0.0263 (0.572)	-0.479 (1.136)
生活费指数				-0.0352 (0.0269)	-0.0473 (0.0403)	-0.127 (0.0947)
胜诉率				-0.408 *** (0.124)	-0.488 ** (0.204)	-0.754 (0.67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434 (0.841)	-1.741 (1.116)	-0.848 (2.535)	-26.18 ** (10.48)	-5.428 (20.00)	-63.76 (37.99)
观测值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R ²	0.213	0.198	0.105	0.260	0.219	0.131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二) 工具变量回归

在基准回归中,上海商品进口波动会影响上海各行业中的劳资冲突发生程度,但近代中国政府调整进口关税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而非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①因此上海劳资关系的激化或缓和基本不影响或改变商品进口数量,即本文受到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较小。然而商品进口变动对劳资冲突的影响不仅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倾销行为,还包含了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需求的变动,而遗漏的国内市场需求可能会造成结果的估计偏差。

为了解决潜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通过构造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若内生性存在于某一地区层面,那么排除某一地区后的全国层面的变量对于某地区来说就是一个外生变量。^②因此,本文用除上海市外的全国其他地区商品进口数量作为上海商品进口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相关性指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必须相关,外生性指工具变量和随机扰动项不相关。因为全国其他地区与上海面临相似的产业结构,所以全国其他地区商品进口数量与上海商品进口数量十分关联,即满足相关性。同时考虑近代中国的交通不便,各口岸进口商品难以最终涌入上海,并直接影响上海的劳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亦具有外生性。

①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78页。

② David Card and Alan B. Krueg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1994), pp. 772 - 793; Daniele Coen-Pirani, Alexis León, and Steven Lugauer,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Appliances o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Labour Economics*, Vol. 17, No. 3 (2010), pp. 503 - 513.

表3 商品进口冲击影响劳资冲突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案件数(log)	关系厂号数(log)	关系工人数(log)
商品进口数量(log)	0.512** (0.2122)	0.658*** (0.234)	0.690*** (0.248)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0.290** (0.122)	-0.249 (0.191)	-0.581** (0.262)
工会会员率	-0.0440* (0.0266)	-0.0367 (0.0454)	-0.099** (0.0496)
上海户籍人口(log)	4.867 (5.321)	8.448 (7.910)	9.433 (12.213)
每小时工资率	0.086 (0.505)	0.113 (0.720)	0.9556 (0.800)
生活费指数	-0.039 (0.187)	-0.0806 (0.0861)	-0.105 (0.114)
胜诉率	-0.324* (0.187)	-0.386 (0.252)	-1.031** (0.42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26.18** (10.48)	-5.428 (20.00)	-63.76 (37.99)
观测值	189	189	189
R ²	0.260	0.219	0.131
F统计量	32.858	32.858	32.858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表3为2SLS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第(1)—(3)列被解释变量依次以劳资冲突案件数(log)、关系厂号数(log)、关系工人数(log)来衡量。一阶段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32.85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第(1)—(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商品进口数量)的系数仍然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因果关系十分稳健。当商品进口数量变动100%,劳资纠纷案件数上升51.2%,即回归(1)中商品进口数量的系数为0.512,关系厂号数上升65.8%,即回归(2)中商品进口数量的系数为0.658,关系工人数上升69%,即回归(3)中商品进口数量的系数为0.690。将表3中(1)—(3)列的估计结果与表2中第(4)—(6)列的估计结果比较,不难发现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高于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这意味着基准回归模型结果稳健,并且工具变量纠正了遗漏变量导致的对劳资冲突影响低估的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1. 研究方法敏感性检验。本文基准回归使用可以控制不随个体和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但是由于部分行业年度发生劳资冲突的数量为零,亦可能造成有偏的回归结果,因此本部分将使用Tobit模型和Possion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第(1)—(3)列为Tobit的回归结果,第(4)—(6)列为Possion的回归结果。所有的回归结果——(1)到(6)列的商品进口数量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都显示商品进口数量上升会增加劳资冲突的案件数、关系厂号数和关系工人数。本研究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4 研究方法敏感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Tobit			Poisson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案件数	关系厂号数	关系工人数
商品进口数量 (log)	0.260 *** (0.0456)	0.367 *** (0.0758)	0.550 *** (0.159)	0.271 *** (0.0499)	0.244 *** (0.0645)	0.170 ** (0.0733)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0.354 (0.230)	-0.364 (0.380)	-0.867 (0.803)	-0.331 ** (0.156)	-0.259 (0.214)	-0.211 (0.168)
工会会员率	-0.0353 (0.0326)	-0.0241 (0.0538)	-0.148 (0.114)	-0.0224 (0.0283)	-0.00818 (0.0524)	-0.0394 (0.0500)
上海户籍人口(log)	6.702 (5.126)	12.24 (8.490)	39.96 ** (17.94)	1.751 (4.121)	-0.0918 (6.611)	0.619 (9.182)
每小时工资率	0.0592 (1.096)	0.193 (1.810)	-0.205 (3.835)	-0.0898 (0.381)	0.346 (0.631)	-0.376 (0.952)
生活费指数	-0.0742 (0.0513)	-0.140 (0.0849)	-0.378 ** (0.179)	-0.0139 (0.0526)	-0.0161 (0.0793)	-0.0457 (0.0979)
胜诉率	-0.613 *** (0.167)	-0.866 *** (0.278)	-1.407 ** (0.583)	-0.295 (0.234)	-0.720 * (0.403)	-0.898 ** (0.39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89.00 (69.47)	163.7 (115.0)	-538.1 ** (243.1)	-24.01 (55.08)	3.649 (88.97)	2.539 (123.2)
观测值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Pseudo R ²	0.530	0.357	0.274	0.702	0.629	0.824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2. 指标敏感性检验。劳资冲突的数量和程度是本文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了排除行业规模,尤其是劳工规模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部分采用劳资冲突的相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近代中国各类统计数据中没有多年的行业数据,本文采用可信度较高的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数据进行整理,并得到1933年各样本行业工厂和劳工数量,从而构建劳资冲突的相对数变量。主要包括:案件率,定义为劳资冲突案件数与1933年该行业劳工人数比值的1000倍^①;关系厂号比重,定义为劳资冲突关系厂号数与1933年该行业工厂号数比值;关系工人比重,定义为关系工人数与1933年该行业劳工人数比值。最终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发现商品进口增多依然会增加劳资冲突,本文结果稳健。

表 5 指标敏感性检验

变量	(1)	(2)	(3)
	案件率	关系厂号比重	关系工人比重
商品进口数量(log)	0.425 * (0.2201)	0.091 *** (0.0261)	0.051 * (0.0295)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1.906 * (1.072)	-0.050 (0.087)	-0.113 (0.145)
工会会员率	-0.0752 (0.254)	-0.0223 ** (0.00849)	-0.0384 *** (0.0106)

① 扩大1000倍是为了消除数级差。同时,为了剔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本部分对劳资冲突程度的衡量指标进行了缩尾,将大于其90百分位的数值替换为其90百分位数值。

续表 5

变量	(1)	(2)	(3)
	案件率	关系厂号比重	关系工人比重
上海户籍人口(log)	3.875 (5.761)	-0.0375 (0.618)	-0.0855 (0.528)
每小时工资率	-2.488 (1.547)	-0.166 (0.227)	-0.331* (0.182)
生活费指数	-0.157 (0.229)	-0.0161 (0.0181)	-0.0071 (0.0163)
胜诉率	-1.640* (0.860)	-0.124 (0.0865)	-0.0835 (0.091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39.25 (58.05)	1.736 (7.420)	1.902 (6.264)
观测值	189	189	189
R ²	0.083	0.199	0.104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3. 排除替代性解释检验:企业管理制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管理之风吹入中国,不少企业开始尝试新的科学管理方法,但因为各种原因反而导致了不少劳资冲突。^① 本部分将因包工制、包机制、科学管理制度、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等制度调整产生的劳资冲突案件剔除在样本之外,以排除该替代性解释。最终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不管劳资冲突以案件数(回归1)、关系厂号数(回归2)、还是关系工人数(回归3)来表示,商品进口数量和劳资冲突依然显著的正相关(系数显著为正)。本文结果依旧稳健。

表 6 排除替代性解释:企业制度

变量	(1)	(2)	(3)
	案件数(log)	关系厂号数(log)	关系工人数(log)
商品进口数量(log)	0.236*** (0.0641)	0.297*** (0.0681)	0.544*** (0.171)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0.128 (0.0929)	-0.0257 (0.130)	-0.174 (0.325)
工会会员率	-0.0283* (0.0141)	-0.0138 (0.0170)	-0.139*** (0.0422)
上海户籍人口(log)	2.626*** (0.740)	1.994** (0.887)	8.388*** (2.683)
每小时工资率	-0.153 (0.353)	-0.220 (0.334)	-0.901 (1.220)
生活费指数	-0.0326 (0.0273)	-0.0307 (0.0258)	-0.101 (0.0942)
胜诉率	-0.360*** (0.121)	-0.352** (0.133)	-0.691 (0.65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35.25*** (9.101)	-26.89** (11.69)	-110.9*** (31.28)
观测值	189	189	189
R ²	0.286	0.246	0.198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① 田彤:《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第26—37页。

4. 排除替代性解释检验:爱国情怀。近代中国长期遭受侵略,为了救亡图存、挽救国家产业,各界亦是为抵制外货、保卫国货而不遗余力。在每次中国遭遇军事侵略,如“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抵制外货的运动更是达到高潮。为排除爱国情怀对劳资冲突的影响,在基准回归控制年度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删除了所有发生在外资企业的劳资冲突案件。最终的估计结果如表7的第(1)—(3)列所示,即使排除了爱国情怀,商品进口数量依然显著地影响劳资冲突的发生。具体来说,商品进口数量每增加100%,劳资冲突案件数增加26.9%,关系厂号数增加35%,关系工人数增加51.4%。本文结果依旧稳健。

表7 排除替代性解释:爱国情怀

变量	(1)	(2)	(3)
	案件数(log)	关系厂号数(log)	关系工人数(log)
商品进口数量 (log)	0.269 *** (0.0755)	0.350 *** (0.104)	0.514 ** (0.202)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0.367 ** (0.145)	-0.402 * (0.200)	-2.427 *** (0.438)
工会会员率	-0.00339 (0.0218)	0.00144 (0.0307)	-0.184 *** (0.0314)
上海户籍人口 (log)	2.248 ** (0.834)	0.905 (1.603)	6.068 * (3.160)
每小时工资率	0.0144 (0.394)	-0.0133 (0.708)	0.112 (1.267)
生活费指数	-0.0430 * (0.0240)	-0.0604 (0.0374)	-0.146 (0.0929)
胜诉率	-0.364 *** (0.118)	-0.456 ** (0.209)	-0.769 (0.65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29.02 ** (10.73)	-8.265 (20.44)	-71.68 * (39.24)
观测值	189	189	189
R ²	0.276	0.231	0.185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五、近代商品进口冲击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机制

以上研究表明,商品进口增多会激化劳资关系,但相应的影响机制还须进一步探讨。本文从相关史料中发现商品进口冲击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机制如图5所示:首先,商品进口冲击对企业经营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为了应对冲击,企业主要采取裁减劳工或降低日工资两种措施维持生存。最后,劳工与企业间因为企业的不同措施而产生不同的劳资冲突——劳资纠纷或罢工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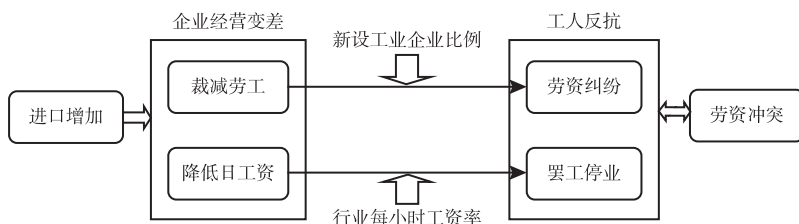


图5 近代商品进口冲击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机制

由于近代缺乏历年各行业产出的数据资料,显然我们无法对贸易冲击带来的行业经营状况等进行量化分析,但是劳资冲突发生最多的纺织工业存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这些资料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完整的影响机制。因此接下来我们以申新纱厂和永安纱厂为例,通过案例来分析整个影响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和行业每小时工资率对劳资冲突的调节效应,补充验证企业应对冲击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不同形式的劳资冲突。

(一)申新纱厂和永安纱厂的案例分析

申新纺织公司是我国最大的民族纺织厂,有纱厂9处,共有纱锭55.268万枚,占有纱锭总数20.6%。^①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前名为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民族棉纺织工业中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1933年,永安纱锭共有25.6264万枚,占上海华厂纱锭总数112.6204万枚的23%。1933年日棉倾销导致由上海扩散至全国的减工风潮,时年3月上海存纱达16.0527万包,4月达16.8665万包,同时,日本进口棉纱“又形活跃”,计3月份1153担(值银18.0161万元),4月份增至1410担(值银221.1047万元)。“存纱越多,市场越坏”。^②商品进口冲击导致两家企业的销量下降和亏损,但由于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最终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劳资冲突。

1. 申新纱厂。商品进口冲击成为影响企业盈利的重要因素。1933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呈国民党备案,宣布全部减工:“窃自1928年以还,世界经济状况,日益衰落,各国均苦生产过剩,利用倾销之法,拓展国外市场。我国关税最轻,遂成倾销尾闾。”根据申新一厂和八厂的损益表,1933年损益为0.23千元,1934年上半年损益为-147.95千元,1935年申新纱厂系统各厂损益为-1271.51千元。^③

为了维持生存,申新纱厂同时采取裁减工人和降低工资两种措施,从而导致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频发。1933年4月29日,申新总公司致各厂函:“本公司因环境关系,已议决各厂实行减工,同时实行紧缩。如工人赏工、职员升工应一律取消,日用各种物料应减省,各种材料价格应减低,至职员工人应自5月1日起实行减少,是为至要”。申新一厂和八厂的档案资料也表明,1932—1936年,申新公司转嫁危机的方式是裁减工人和降低劳工工资并举。申新一厂和八厂工人人数由1933年8244人降至1936年5910人,工人年平均工资由1933年167.7元降至1936年153.8元。^④申新公司应对冲击的此种措施,导致1933—1936年共发生劳资冲突43件,其中劳资纠纷28件,因解雇而产生的纠纷案件共19件,占申新纱厂纠纷案件总数的67.86%;罢工停业15件,因工资产生罢工案件共8件,占申新纱厂罢工停业案件总数的53.33%。

2. 永安纱厂。1933年前后永安纱厂也受到商品进口对企业盈利的冲击。“永安纱厂从1932年起成品积压导致货币资金的短绌和销蚀。这固然有永纱企业‘趁低趸购’、‘待价而沽’的营业方针的主观因素导致,但归根结底,还是帝国主义压迫日甚,市场逆势加深,造成民族工业资本不能正常运用的必然结果。”正如1934年5月郭乐在永安纱厂股东大会报告中所说:“年来日本纱厂制有巨量日纱贬价竞售,在吾国倾销,纱布市场顿形黯淡。我华厂为竞争起见,不得不随之减价,以资应对”。同时期永安纱厂盈利数据表明1933年前后其盈利下跌。1932年永安纱厂盈利152.259万元,1933年盈利降至70.2469万元,1934年再降至34.0288万元。永安纱厂为减轻自身负担,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裁减工人。据统计,永安纱厂的人数从1927年的6350人扩大至1932年的12764人。^⑤但随着1933年前后市场不景气,纱布销路呆滞,资本家为减轻自身负担,从1933年4月起实行停工减产,大量裁减工人,减少班次和扩大看锭看台等,永安纱厂的工人总数大大减少,至1934年止,工人总数减少到9115人,比1932年减少3649人,达

① 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编印:《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1934年印行。

②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138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4、366页。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第558页。

⑤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202、213、232页。

28.59%。永安纱厂裁减工人的方式致使1928—1936年共发生劳资纠纷14起。

在劳工工资方面,永安纱厂虽然单位工资被削减,但是因工作强度增加,工人到手货币工资却有所上涨或保持不变。“细纱接头女工,从前每人最多只派50至60木杆,现在竟增至80至90木杆;粗纱值车女工,从前每人值车一台,尚需用助手一名,今则一人值两台,反将助手裁去;摇纱从前每车40根头,现在改为50根头”,而工资情况“从前每根细纱木杆给一分至一分四厘,现在减至7厘至9厘;从前每一粗纱亨司为七分或九分,今减为五分至七分;摇纱车比从前多10根头,而工资和以前一样”。^①从上述史料可以简单计算出劳工货币工资变动情况,细纱接头女工工资由5元($50 \times 1 = 5$ 元)增至5元6分($80 \times 0.7 = 5.6$ 元),粗纱值车女工由7分($1 \times 0.7 = 0.7$ 元)增至1元($2 \times 0.5 = 1$ 元),摇纱工工资保持不变。永安纱厂采取裁减工人以及增加劳动强度维持原有工资的方式使得1933—1936年永安纱厂劳资冲突以劳资纠纷为主,罢工仅有一例且发生在1936年。

比较申新纱厂和永安纱厂的史料,可以看出1933年前后,商品进口冲击挤压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空间。为了维持生存,资本家采取裁减工人和降低日工资的措施,导致劳资之间纠纷或罢工不断。近代两家最大的棉纺织工厂,在面对危机时,申新纱厂降低日工资和裁减工人并举,导致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均频繁发生,而永安纱厂以裁减工人和增加劳动强度维持原有日工资的方式,使得永安纱厂主要以劳资纠纷为主而少有罢工。

(二) 机制检验

以上案例反映企业面临外部冲击时的不同行为选择会带来不同形式的劳资冲突,即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本部分通过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和行业每小时工资率对劳资冲突的调节效应,来补充验证商品进口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机制。具体逻辑如下:

一方面,行业内新设工业企业比例代表了当时行业内对劳动力的需求,当行业新设工业企业比例越高,行业的劳工需求就越高,此时现存企业所裁减的劳工更容易找到工作,即被解雇劳工不易与企业发生纠纷或冲突。因此新设工业企业比例能够调节企业采取裁减劳工所带来的劳资纠纷数。另一方面,行业内劳工每小时工资率代表了劳工现有的收入状况,当企业采取降低日工资的措施时,相比每小时工资率较低的行业,较高工资率的行业劳工发动罢工的概率会较低;相反,如果行业工资率已经是较低水平了,企业再降低日工资,就容易激起工人人们的罢工。

调节效应的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Import_{it} + \alpha_2 Import_{it} * L.Shfirm_{it} + \Gamma Control_{it} + \the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Y_{it} = \beta_0 + \beta_1 Import_{it} + \beta_2 Import_{it} * Wage_{it} + \Gamma Control_{it} + \the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模型(2)通过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对劳资纠纷的调节作用,来验证商品进口增加通过裁减劳工进而增加劳资纠纷的影响机制。被解释变量 Y_{it} 分为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两种形式劳资冲突,每种形式分别包括 $lconflict$ 、 $lfrim$ 和 $lemployee$ 三个度量指标,分别表示年度 t 行业 i 劳资冲突发生案件数、关系厂号数和关系工人数。 $Import_{it}$ 与前文相同,表示商品进口数量。我们重点关注交互项 $Import_{it} * L.Shfirm_{it}$,其中 $L.Shfirm_{it}$ 表示年度 t 行业 i 滞后一期的新设工业企业比例。结合史料记载,工资的调整是即时行为,解雇劳工是延时行为。如1933年减工风潮中,天津纱厂议定:“自5月上旬,工资照8折发放”,恒源纱厂“工人工资按75折发放”,申新三厂“每匹布减少工资八厘”,均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奏效。^②而对于解雇劳工,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就资方解约做了具体规定,限制了资方解约的任意性。^③因此,从

① 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227页相关内容,结合1930年《纺织时报》所载永安三厂织布科女工看台率变化,可判断事件描述发生在1929—1936年间。

② 田彤:《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年)》,第139—140页。

③ 其中允许资方提前解约的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因工厂发生严重亏损或转产而宣告全部或部分歇业;二是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工厂无法正常生产停工在一个月以上;三是因体力或技能等因素工人不能按要求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冲击开始到企业正式采取措施存在时滞。 $Control_{it}$ 为一系列与行业特征和年度趋势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滞后一期的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当期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工会会员率、每小时工资率、劳方胜诉率、上海生活费指数、上海年度户籍人口数。 θ_i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μ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误差项。根据行业内新设工业企业比例的影响机制:商品进口增加通过裁减劳工进而增加劳资纠纷,因此 α_2 在劳资纠纷形式的劳资冲突下将为负数,并且在罢工停业形式的劳资冲突下不显著。

模型(3)用来衡量商品进口冲击通过劳工日工资对劳资冲突的影响机制。 Y_{it} 、 $Import_{it}$ 、以及 θ_i 、 μ_t 和 ε_{it} 与模型(2)均一致。我们同样重点关注交互项 $Import_{it} * Wage_{it}$,其中, $Wage_{it}$ 表示年度 t 行业 i 的工人每小时工资率。 $Control_{it}$ 与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一致,为一系列与行业特征和年度趋势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当期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工会会员率、每小时工资率、劳方胜诉率、上海生活费指数、上海年度户籍人口数。根据历史资料推论的影响机制为:商品进口增加通过降低劳工日工资进而增加罢工停业,因此 β_3 在罢工停业形式的劳资冲突下将为负数,并且在劳资纠纷形式的劳资冲突下不显著。

表8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衡量行业内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对商品进口冲击带来劳资冲突的调节能力,并进而验证商品进口数量通过裁减工人并导致劳资纠纷的影响机制。其中,第(1)—(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劳资纠纷。第(4)—(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罢工停业。第(1)—(3)列回归结果表明,商品进口数量和新设工业企业比例滞后项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约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回归3为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新设工业企业比例的调节效应显著,从而间接验证了近代商品进口增多通过减少劳工雇佣增加了劳资纠纷。新设工业企业比例每增加100%,商品进口冲击对劳资纠纷案件数的影响下降18.1%,对关系厂号数的影响下降21%,对关系工人数的影响作用下降44.6%。同时,第(4)—(6)列显示无论是以罢工停业案件数,还是罢工停业关系厂号数和关系工人数,商品进口数量和新设工业企业比例滞后项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未显著。这说明劳资纠纷类劳资冲突在面临商品进口数量冲击时受到新设工业企业比例的调节是稳健的。这恰好补充验证了在面临进口冲击时,行业采用减少雇佣的措施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劳资纠纷形式的劳资冲突。

表8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对商品进口导致劳资纠纷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2)	(3)	(4)	(5)	(6)
	劳资纠纷			罢工停业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商品进口数量(log)	0.213*** (0.0435)	0.316*** (0.0608)	0.421*** (0.129)	0.0671 (0.0449)	0.134** (0.0568)	0.246 (0.148)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滞后项	2.166*** (0.613)	2.691*** (0.921)	6.027* (2.941)	-0.691 (0.947)	-0.515 (1.445)	-4.219 (3.096)
商品进口数量×新设工业企业比例滞后项	-0.181*** (0.0480)	-0.210*** (0.0714)	-0.446* (0.221)	0.0141 (0.0697)	-0.00496 (0.116)	0.162 (0.218)
每小时工资率	0.289 (0.285)	0.235 (0.610)	-0.155 (0.847)	-0.816** (0.318)	-0.456 (0.328)	0.212 (0.860)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0.199 (0.153)	-0.232 (0.206)	-2.172*** (0.334)	0.0322 (0.142)	0.111 (0.130)	0.945 (0.817)
工会会员率	-0.0112 (0.0239)	-0.0299 (0.0274)	-0.250*** (0.0740)	0.0109 (0.0211)	0.0609 (0.0817)	0.0177 (0.0600)
上海户籍人口(log)	0.389 (0.546)	-0.417 (0.922)	1.057 (1.772)	0.733 (0.648)	0.654 (0.722)	2.670 (2.194)
生活费指数	-0.0187 (0.0213)	-0.0371 (0.0235)	-0.0278 (0.0588)	-0.00807 (0.0215)	0.00131 (0.0243)	-0.0783 (0.0744)
胜诉率	0.588*** (0.128)	0.840** (0.312)	2.356*** (0.545)	0.745*** (0.0917)	0.969*** (0.170)	3.938*** (0.419)

续表 8

变量	(1)	(2)	(3)	(4)	(5)	(6)
	劳资纠纷			罢工停业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894 (7.421)	7.698 (13.32)	-13.59 (24.83)	-9.876 (8.373)	-10.61 (9.348)	-30.80 (27.08)
观测值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R ²	0.354	0.336	0.351	0.366	0.333	0.534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表 9 为模型(3)的回归结果,衡量了行业每小时工资率对劳资冲突的调节能力,进而验证了商品进口数量通过降低劳工工资导致罢工停业的影响机制。其中,第(1)—(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罢工停业。第(4)—(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劳资纠纷。第(1)—(3)列回归结果表明,商品进口数量与劳工每小时工资率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5% (回归 2)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每小时工资率每增加 1%, 商品进口冲击对罢工停业案件数的影响下降 1.64%, 对关系厂号数的影响下降 2.5%, 对关系工人数的影响下降 4.59%。第(4)—(6)列显示无论是以劳资纠纷案件数, 还是劳资纠纷关系厂号数和关系工人数来度量劳资冲突, 商品进口数量与劳工每小时工资率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说明罢工停业类劳资冲突在面临商品进口数量冲击时受到行业劳工每小时工资率的调节是稳健的。这补充验证了在面临进口冲击时, 企业采用降低劳工日工资的措施, 会增加罢工停业形式的劳资冲突。

表 9 劳工工资水平对商品进口导致罢工停业的调节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罢工停业			劳资纠纷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商品进口数量(log)	0.213 ** (0.0760)	0.342 *** (0.104)	0.655 *** (0.215)	0.215 *** (0.0614)	0.181 (0.132)	0.215 (0.187)
每小时工资率	24.81 (14.75)	38.66 ** (17.99)	71.92 * (35.39)	-1.247 (11.57)	-28.75 (17.40)	-43.17 (29.93)
商品进口数量 × 每小时工资率	-1.640 * (0.938)	-2.503 ** (1.146)	-4.587 * (2.243)	0.100 (0.738)	1.861 (1.120)	2.759 (1.901)
新设工业企业比例	0.130 (0.0988)	0.278 ** (0.107)	1.078 * (0.605)	-0.234 (0.162)	-0.212 (0.231)	-2.213 *** (0.388)
工会会员率	-0.0119 (0.0197)	0.0380 (0.0613)	-0.106 (0.0814)	-0.0313 * (0.0154)	-0.0377 (0.0254)	-0.248 *** (0.0738)
上海户籍人口(log)	0.709 (0.795)	-0.768 (1.043)	3.394 (3.065)	1.510 ** (0.601)	0.345 (1.162)	1.539 (1.984)
生活费指数	-0.00627 (0.0246)	0.0123 (0.0271)	-0.0791 (0.0844)	-0.0255 (0.0233)	-0.0410 (0.0255)	-0.0281 (0.0588)
胜诉率	0.747 *** (0.0872)	1.054 *** (0.143)	3.862 *** (0.413)	0.667 *** (0.115)	0.963 *** (0.289)	2.746 *** (0.463)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9

变量	(1)	(2)	(3)	(4)	(5)	(6)
	罢工停业			劳资纠纷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案件数 (log)	关系厂号数 (log)	关系工人数 (log)
常数项	-11.88 (9.678)	5.721 (13.41)	-47.24 (36.78)	-20.49*** (6.962)	-0.959 (15.20)	-17.61 (26.26)
观测值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R ²	0.344	0.336	0.474	0.411	0.336	0.379

说明: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综合以上检验可知,近代商品进口增多会压缩国内商品的市场空间,国内相关行业会通过减少劳工雇佣来降低生产成本,导致劳资纠纷形式的劳资冲突;也会通过降低劳工日工资来应对商品进口冲击,从而增加了劳工罢工形式的劳资冲突。

六、结论

劳资冲突是所有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内在矛盾。在缓和劳资矛盾和稳定社会发展中,找到影响劳资冲突的因素并防患于未然是社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利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上海劳资冲突相关微观统计数据,以上海市为例对商品进口冲击和劳资冲突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表明:商品进口增多会激化劳资冲突。这一结论在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更换模型和指标、排除替代性解释(企业制度和爱国情怀)后依然成立。进口商品增加对国内劳资冲突的影响机制为:进口贸易冲击带来国内企业的经营困难,一方面,国内企业会通过减少劳工雇佣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劳资纠纷形式的劳资冲突;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降低劳工日工资来应对商品进口冲击,并导致了罢工停业形式的劳资冲突。

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理论上完善了国际经济冲击对国内劳资冲突影响的相关研究,从应用上提供了解决国内劳资冲突的可选择路径。该结论不但对认识历史有参考价值,对解决未来中国的劳资纠纷问题也有借鉴意义。中国国内近十年来劳资矛盾有所增加,不仅表现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劳动争议调解和基层人民自发调解相关统计数据的增长,也体现在一些犯罪上。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出发,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些劳资冲突并有助于制定更合适的应对政策。

International Import Shock and Labor Conflict —Evidence from Modern Shanghai (1928 – 1936)

Li Yaohua, Di Danyang

Abstract: Did the import shock affect domestic labor conflict?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statistical data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a's Old-Customs and labor conflict in modern Shanghai,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import shock on labor confli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commodity imports will increase labor conflicts. And the related impacting mechanism is imported goods eroded the domestic market, forced the firm in China to lay off works and cut wages, and at last caused labor conflicts.

Keywords: Commodity Import, Labor Conflict, Modern Shanghai

(责任编辑:高超群)